

制度创新与国际竞争优势丛书

System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Theories, Models and Empirical

王涛生 / 著

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 竞争优势

——理论、模型与实证



科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获得湖南省重点学科“国际贸易学”学科建设经费、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湖南涉外经济学院专著出版基金资助

制度创新与国际竞争优势丛书

System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International Trade

—— Theories, Models and Empirical

王涛生 / 著

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 竞争优势

——理论、模型与实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理论、模型与
实证 / 王涛生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5058 - 9693 - 2

I. ①制… II. ①王… III. ①企业 - 对外投资 - 研究 -
国际贸易学: 产业经济学—研究 IV. ①F279.2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8554 号

责任编辑: 沙超英 赵 蕾
责任校对: 王苗苗 王凡娥
技术编辑: 李 鹏

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

——理论、模型与实证

王涛生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88191540

网址: 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esp.com.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16 开 20.75 印张 380000 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693 - 2 定价: 39.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国际贸易优势的源泉一直是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关注的重大问题。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已经对成本差异、要素禀赋、技术差距和规模经济等因素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对国际贸易的模式及其比较优势做出了有益的解释。然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成本差异、技术差距和规模经济等因素不过是国际贸易优势本身的表现形式，而非原因。若要弄清不同经济体（国家或区域）的成本、技术和规模等为什么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又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就不得不对决定上述诸因素差异的各种制度体系及其变迁作进一步研究。毋庸讳言，已有的贸易理论缺乏对国际贸易竞争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作用机理作了深入系统的探索，因而未能从制度差异视角对现代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源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样遗憾的是，着眼于从制度差异视角解释经济增长的新制度学派，又没有把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作为重点来关注，加上制度因素本身存在难以量化的不足，从而使国际贸易优势与制度之间的研究，既缺乏严谨的数理论证，又缺乏严密的实证分析，这就造成了现代国际贸易优势理论与新制度学说间事实上的相互割裂。本研究以此作为切入点，尝试打通二者的关系，弥补这一“割裂”，以期从制度创新视角揭示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新源泉。这对于丰富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源泉理论，提高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解释力，应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

“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制度创新已使我国由贸易小国发展为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要使我国由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关键就是要增强对外贸易竞争力，形成国际贸易竞争新优势。然而，当前国内经贸运行的体制机制性障碍还相当突出，国外贸易保护制度引起的潜在风险与不确定因素增多，致使我国外贸竞争力的增强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的自然资源禀赋逐步衰竭，依赖于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正在消逝，交易成本持续上升，效率竞争优势存在“悖论”，以技术、品牌和质量为核心的新优势仍然相当脆弱……在此背景下，如何保持现有出口优势，加快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已成为开放经济新形势下我国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因此，从现实看，本研究选择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探索，力求为持续增强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制度创新提供理论依据。这对于中国深化体制改革，优化制度安排，构筑有效的激励机制，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出口结构，扩大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形成对外贸易可持续竞争的新优势，加快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步伐，显然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本研究的基本思路

从制度的结构体系与作用机理的解读入手，提出制度创新是一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源泉的假说。运用因果分析、逻辑演绎与数理推导相结合的方法，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对这一假说展开分析和论证。在此基础上，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系统与层面相结合、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将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问题摆在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现在与未来的总体坐标上进行全方位研究与探讨。定量实证分析主要运用因子分析法、多元回归法、模糊综合法等计量工具，构建动态的结构方程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内在关系进行全视角多层面透视与实证分析，从

而论证制度创新是国家获取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最后对中国形成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的制度创新提出基本构想。

（二）本研究的基本架构

首先，从制度质量、国际贸易优势源泉、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三个维度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国内外文献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以此作为本研究的基础。

第2章至第4章侧重探索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其中，第2章从制度质量影响出口交易成本的视角探索了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成本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与作用路径；第3章从制度质量影响出口生产效率的视角探索了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效率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与作用路径；第4章从制度质量影响出口产品创新的视角探索了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创新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与作用路径。

第5章侧重探索制度质量的评价与量化问题。在讨论制度质量测评的依据、方法以及指标选取原则的基础上，从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企业制度、宏观管理制度和涉外经贸制度五个层面构建了制度体系质量的计量模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指数。

第6章侧重探索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问题。在讨论多角度评价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方法及其指标选取原则的基础上，从一国的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出口盈余、出口质量、出口效率和出口创新六个方面构建了国际贸易竞争力的计量模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指数。

第7章至第9章对制度质量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第7章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以制度质量及其21个二级指标为解释变量，以国际贸易竞争力及其6个一级指标为被解释变量，利用2001~2007年33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对制度质量影响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第8章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把制度质量、要素禀赋、成本差异、技术差距和规模经济等主要因素纳入了统一的比较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各因素对

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差异；第9章以日本为实例，从企业制度、产业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和贸易制度五个方面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制度创新促进其出口竞争优势增强的传导机制与作用路径。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均有力地支持了本研究提出的理论假说。

其次，根据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结论，从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企业制度、宏观管理制度和涉外经贸制度五个层面对我国增强对外贸易成本、效率和创新竞争力，加快形成以技术、质量和品牌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制度创新提出了构想。

（三）本研究的主要观点

（1）提出并论证制度创新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三个重要观点：国家之间的制度差异是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差异的主要因素；制度优势是一国获取、保持和增强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制度创新是制度优势的唯一源泉，因而是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本源。（2）探索并揭示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三大作用机制：一是出口成本约束机制，即制度创新降低出口交易成本的内在机制，形成国际贸易成本竞争力；二是出口效率激励机制，即制度创新提高出口生产效率的内在机制，形成国际贸易效率竞争力；三是出口创新动力机制，即制度创新驱动出口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形成国际贸易创新竞争力。（3）各种制度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因此对一国制度质量的评价，必须考察其整个制度体系，而不应只关注某一层面的个别制度。据此，我们将一国的经贸制度体系区分为产权制度、市场交易制度、企业制度、宏观管理制度和涉外经贸制度五个层级，并设计了度量制度体系的计量模型和评价指标体系。（4）对国际贸易竞争力的评价应力求全面、公正、客观，不能只重总量，不重结构与质量。据此，我们以出口规模、出口结构、出口盈余、出口质量、出口效率和出口创新为主要指标，构建了全面衡量国际贸易竞争力的计量模型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5) 本研究以制度体系为自变量、国际贸易综合竞争力为因变量,设计了结构方程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对制度质量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效应进行多维实证检验。

(四) 本研究的主要特色与创新

(1) 系统论述了制度创新影响国际贸易成本竞争力、效率竞争力和创新竞争力的内在机理与作用路径,拓宽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沟通了新制度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填补了新制度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之间的相互“割裂”;(2) 系统探索了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内在传导机制,从制度创新角度揭示了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新源泉,提高了国际贸易理论对当代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解释力,弥补了本学科领域传统主流理论的不足;(3) 首次构建了度量制度体系的计量模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指数,尝试解决制度体系的量化难题、突破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瓶颈;(4) 首次构建了全面衡量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综合计量模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指数,尝试克服以往偏重总量、轻视结构的国际贸易竞争力评价方法的局限性;(5) 首次选择制度体系为解释变量、国际贸易综合竞争力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创建了新的实证模型,构筑了制度体系创新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框架,尝试克服以往文献仅从契约合同、或腐败治理、或经济自由度单一视角探索制度因素对国际贸易影响效应的局限性。

制度影响国际贸易竞争力的研究,已成为当代国际经济贸易理论研究前沿的重大热点问题,但是,从总体来看,仍然处于初始阶段。本研究意在抛砖引玉,难免存在偏颇与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王涛生

2010年10月

目录

第1章 绪论 / 1

- 第1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1
- 第2节 国际贸易优势源泉的主流理论综述 / 4
- 第3节 国际贸易优势与制度关系的研究综述 / 30
- 第4节 基本框架、主要特色与创新 / 46

第2章 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成本优势的机理 / 51

- 第1节 制度的内涵、结构与基本功能 / 51
- 第2节 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成本优势的机理 / 70
- 第3节 制度创新形成贸易成本优势的案例分析 / 100

第3章 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效率优势的机理 / 104

- 第1节 制度决定国际贸易效率优势理论的提出 / 104
- 第2节 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效率优势的微观机理 / 111
- 第3节 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效率优势的市场机理 / 130
- 第4节 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效率优势的宏观机理 / 132

第4章 制度创新形成国际贸易创新优势的机理 / 137

- 第1节 制度决定国际贸易创新优势理论的提出 / 137
- 第2节 新产品开发的动态均衡模型 / 140
- 第3节 基于制度因素的新产品开发模型 / 146

第4节 封闭经济下制度对创新组织与团队规模的影响 / 147

第5节 开放经济下制度差异对贸易模式的影响 / 151

第6节 制度创新对国际贸易创新优势的影响 / 155

第7节 本章小结 / 159

第5章 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161

第1节 制度评价中的基本理论问题 / 161

第2节 制度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167

第3节 制度评价指数的形成 / 186

第6章 国际贸易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 191

第1节 对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评价方法的反思 / 191

第2节 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评价原则与方法 / 206

第3节 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评价模型及指标体系 / 211

第7章 制度创新影响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实证研究 / 220

第1节 模型选择及其基本原理 / 220

第2节 模型变量的选择及其指数化原理 / 226

第3节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 230

第4节 结论 / 241

第8章 基于制度的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决定因素的比较研究 / 243

第1节 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源泉的多因素分析 / 243

第2节 模型的选择与相关变量解释 / 248

第3节 制度与其他竞争优势源泉效应比较 / 251

第4节 结论 / 255

第9章 制度创新决定贸易竞争优势的实例分析 / 256

第1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贸易竞争力的迅速增强 / 256

第2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出口竞争优势形成与
增强的制度成因分析 / 258

第3节 日本制度创新促进贸易竞争优势增强的经验及启示 / 272

第 10 章 我国形成外贸竞争新优势的制度创新思考 / 275

第 1 节 外贸竞争力面临的主要挑战 / 275

第 2 节 形成外贸成本竞争新优势 / 278

第 3 节 形成外贸效率竞争优势 / 286

第 4 节 形成外贸创新竞争优势 / 297

参考文献 / 305

第1节 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是一个复杂系统。新古典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虽然已经对那些最直接的源泉，如成本差异、要素禀赋、规模经济、技术差距和“钻石”因素等进行了开拓性研究，从而对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解释提供了有益的结论，但要继续了解为什么不同经济体（国家或区域）的成本、要素、规模、技术和“钻石”因素等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又是怎样形成的，我们可能就不得不对决定上述诸因素差异的各种制度体系及其变迁作进一步研究。然而，现代贸易理论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忽略了对国际竞争过程中的制度因素作用机理的深入探索，而着眼于从制度视角解释经济现象的新制度学派，又没有把制度变迁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作为重点来关注，加上制度因素本身存在难以量化的先天不足，从而使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与制度之间的研究，既缺乏严谨的数理论证，又缺乏严密的实证分析。这就造成了现代国际贸易优势理论与新制度学说之间事实上的相互割裂。本研究以此作为切入点，尝试打通二者的关系，弥补这一“割裂”，以期在相关理论和应用两方面研究中有所突破。

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组成部分。就一国而言，它表现为对外贸易竞争优势，是指一国能比竞争对手更有效地向世界市场持续提供产品、服务和信誉的经济实力与地位，是国家竞争优势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的主要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较量，很大程度上越来越表现为经济、贸易和科技实力的竞争，并由此导致了国际政治日益经济化的趋势。国际经济贸易的竞争，不仅是世界各国综合实力竞争的

集中体现,而且是世界各国实现其国际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因此,如何获取、保持和增强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已成为各国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国际贸易竞争优势虽然是一个新概念,但对其源泉的探索一直是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竞争战略理论的基础与核心问题。随着经济、贸易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与拓展,国际贸易竞争的深度、广度和强度都在发生变化,从而把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源泉问题的研究推向了更深的层面。以往的国际贸易优势理论已经或正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越来越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解释力,迫切需要新的优势源泉理论来补充和支撑,以便对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源泉做出更合理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李嘉图和 H-O 基于资源禀赋相对差异的外生比较优势论,受到了里昂惕夫之“谜”和林德贸易模式的责难;新贸易理论的核心: D-S 模型和克鲁格曼基于内生报酬递增机制的规模优势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林德贸易模式的成因,但安特温勒和特雷夫勒 (Antweiler and Trefler, 2002) 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它仅能解释 1/3 流量的国际贸易。然而,规模优势的源泉何在呢? 却是一道有待破解的难题。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引发了理论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该理论的突出贡献是整合了以往国际竞争优势研究的主要成果,将要素禀赋、需求规模、产业集聚和企业战略与结构等优势,组合为四个“关键因素”,从而为国家竞争优势战略的制定提供了一个综合性分析框架,并指出这些优势是可以培育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波特对这些“关键因素”的源泉以及如何培育竞争优势等问题,并没有做出深入探究。

从国际贸易竞争的实践来看,下述问题长期令人困惑: 一些初始禀赋相同或相似的国家,若干年后其贸易竞争力为何差距甚大; 一些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为何能形成和拥有持续的国际贸易优势,相反,一些拥有资源优势的国家却长期在贸易劣势中徘徊; 一些缺乏国内市场规模的国家,一些集中度不高的产业,一些规模不大的企业,为何也能在国际贸易中稳占一席之地; 一个国家因故分离若干年之后,其不同体制下的国际竞争力差距为何会如此悬殊; 一个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速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国际贸易地位为何会截然不同……显然,在国际贸易和竞争战略主流理论所阐述的各种优势源泉的背后,一定另有其深层次的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为我们解决上述困惑提供了研究思路。诺思 (North) 和托马斯 (Thomas) 在吸取其前人关于制度作用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变迁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命题,并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这一命题

给予了论证。这一研究成果将经济增长源泉问题的探索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他们对制度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却较少论及。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新制度理论引入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创始人杨小凯等(2001, 2003)率先把交易成本范畴引入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认为国际贸易的交易费用比国内贸易高,只有当贸易国交易效率提高,交易费用降低到小于其潜在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才会发生,而交易效率的高低,则依赖于贸易国的制度环境。但是,总体来看,由于制度因素难以量化,研究者很少从模型、定量与实证角度进行分析,且基本上限于静态的、局部的、单一环节的研究,缺乏动态的、整体的深入系统探讨。

在上述背景下,本书拟选择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研究,提出制度创新是一国获取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和根本源泉的假定,试图揭示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作用机理,探寻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深层次源泉,构建制度优势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模型及其双重评价指标体系,并选择世界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对此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研究将在一定意义上丰富和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竞争战略理论,并可望在一定范围拓展新制度经济学的应用研究,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承诺的逐步兑现和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扩大,如何获取、保持和增强对外贸易竞争优势的问题,已引起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外贸易竞争力也有所提高,但仍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而且这种压力正在逐步加大。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有所抬头,中国的外部环境可能会变得更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内部仍然受制于多种结构性制度缺陷,致使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难以保持和增强。随着廉价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优势的逐渐失去,中国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将面临新的挑战。根据WEF的评价结果,我国国际竞争力已连续三年(2003~2005年)呈现相对下降趋势;根据IMD的评价结果,我国国际竞争力近9年(1997~2005年)中一直处于波动状态,而竞争力相对下降和波动的深层原因,归根到底,主要在于我国自身的制度缺陷。世界经济论坛首席经济学家、全球竞争力报告制作总监奥古斯都·洛佩斯·克劳克斯在谈到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问题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需要加强经济的制度建设,提高教育体系的质量,更好地改善公共机构的服务质量与效率。因此,本书选择制度创新与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关系进行理论及实证研

究,希望能为开放型国家获取和提高对外贸易竞争力的制度设计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中国现行制度体系改革对贸易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促进作用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中国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创新的基本思路。因而这一研究,对于中国形成、保持和增强对外贸易竞争优势,将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2节 国际贸易优势源泉的主流理论综述

国内外学者都对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的研究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仍然存在以下三种倾向:一是偏重于分别对国际贸易竞争优势与制度创新进行考察,缺乏对二者内在关系和作用机理的深入系统研究;二是偏重于国际竞争优势或国际竞争力的研究,而对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探索较少;三是偏重于制度及其重要性的研究,而对制度创新问题的探索甚少。为了比较全面系统地追踪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前沿研究进展,下面将从理论与实证两个视角分别对国际贸易竞争优势、制度创新以及二者关系的研究进展做简要综述。

迄今为止,究竟什么是国际贸易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理论界并未达成共识。根据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竞争战略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经过较为系统的梳理,可将它们分别归类为成本差异、要素禀赋、规模经济、产业组织、创新决定和钻石体系六种主要理论。

一、劳动分工说

劳动分工理论首先由亚当·斯密(A. Smith)提出,经马克思(K. H. Marx)的完善,斯拉法(Sraffa, P.)与阿伦·扬(Young, A.)等人的发展,杨小凯(Yang)和博兰德(Borland, J.)等人的深化,将古典劳动分工决定企业成本优势的思想进一步演化为基于微观专业化分工的内生动态的贸易优势源泉理论。

(一) 斯密的劳动分工论

亚当·斯密在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Theory of Absolute Advantage),又称绝对成本理论

(Theory of Absolute Cost), 用以解释国际贸易优势的直接原因^①。

斯密认为,一国能否参与国际分工,并在国际贸易中胜出,直接取决于它在出口产品的总成本上是否拥有绝对优势。该优势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自然资源优势,包括气候、土壤、矿藏以及其他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相对固定的环境等。他认为,在某些特殊商品的生产中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天然优势有时是极其巨大的,而要与这些天然优势进行挑战,全世界都公认是徒劳无益的。他又说,“如果某个外国供应我们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商品便宜,那就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劳动用于我们有某种优势的部门,而用我们自己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向这个国家购买这种商品。”^②第二,劳动分工,即生产的专业化程度和工人的熟练程度。他认为分工的优势可使一个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方面节约劳动时间,形成成本优势,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格优势。第三,一国的贸易政策。如退税、奖励金等鼓励出口的政策和对原材料、工具、技工出口的限制等。斯密并不主张完全的“奖出限入”,而是主张按照具体情况对于不同商品实行自由贸易或者征收适度的关税。

在上述三个因素中,斯密尤为重视劳动分工。他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必然会提高企业盈利能力和增进社会财富。而“劳动生产力上的最大增进……都是分工的结果”。^③他以制针企业为例子,深入剖析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一是提高了劳动者的技巧和熟练程度;二是节省了劳动者劳动岗位转换的时间;三是便于生产工艺的简化和机械的发明,从而降低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盈利,获得了竞争优势。^④

在此基础上,斯密指出,分工的原则应是各自集中生产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然后交换,购进处于生产劣势的产品,可以获得比自己生产一切产品多得多的利益。他认为,适用于一国内部不同个人和家庭之间的分工原则,也适用于各国之间。他明确指出,“于个别家庭为得策者,于国家亦不致为失策”,^⑤一个国家也要把本国生产的费用和向国外购买的费用加以比较,以便决定是自己生产还是从国外进口。因此,国际分工的原则应是各国都生产成本上占绝对

① 曲如晓、闫庆悦:《新编国际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年版。

②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因的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页。

④ 同上,第8~10页。

⑤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8页。

优势的产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而获利。^①

从斯密关于成本优势的原因分析中不难看出，在国际贸易学说史上，斯密应是最早探索国际贸易竞争优势源泉的，并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例如，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资源禀赋论就是对斯密自然资源差异决定思想的扩展和深化。更重要的是，斯密一开始就突破了静态外生优势的局限，开创了动态竞争优势源泉的研究。这一点，在他主张通过劳动分工专业化和外贸政策调整来创造一国竞争优势的论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但是，在他看来，分工的程度，却要受到市场规模，即“市场广狭的限制”。可见，斯密尚未意识到劳动分工发展与市场容量扩大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时，在他的绝对优势理论中，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贸易双方至少在一种商品的生产成本中具有绝对的优势才能参与对外贸易，这就先验地排除了两个发展水平极不相同的国家相互之间的交换。此外，他没有将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明确区分开来。这些应是斯密劳动分工论的不足。

（二）马克思对劳动分工决定论的完善

马克思在《资本论》（1867）第一卷第12章中对劳动分工组织的重要性做了系统而精深的阐述。他在讨论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后强调，建立在劳动分工基础上的企业生产过程，必须实行严密的计划和组织，以便使生产过程能够保持空间上的并存性、时间上连续性和生产要素的比例性。并以他特有的洞察力，明确指出劳动分工与生产组织是资本家获取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重要手段。这表明马克思已经看到劳动分工与生产组织同资本家降低成本、提高盈利、获取市场优势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分工理论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明确区分了劳动分工、社会分工和地域分工。

（三）斯拉法等人对劳动分工决定论的发展

20世纪20年代，斯拉法（1925）与阿伦·扬（1928）分别讨论了劳动分工与规模报酬递增的内在联系，并尝试突破斯密分工受“市场广狭限制”结论的局限。斯拉法认为，每一类规模报酬都出自不同的经济现象。递增报酬来自积累和技术变化过程，而它们又都与市场扩大及随之而来的劳动分工相联

^① 在斯密看来，分工的程度，却要受到市场规模，即“市场广狭的限制”。可见，由于历史的局限，斯密未能看到劳动分工的发展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同样遗憾的是，斯密也没有把工场内部的劳动分工与不同行业间的社会分工区分开来，后来分别由杨小凯等人完善和发展。